

## “‘第二个结合’与无神论”专题 座谈会发言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观点。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和二十大报告重申了这“两个结合”。“两个结合”最关键的理论突破在于“第二个结合”。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他强调，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了学习贯彻这一重要讲话精神，《科学与无神论》编辑部于7月9日组织了“‘第二个结合’与无神论”专题座谈会。座谈会有关专家的主要发言内容如下。

### 中国传统文化与无神论

李 申（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学术指导委员会委员）

中国文化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传说的黄帝、炎帝时代。在传说时代，形成了中华民族后来一脉相承的上帝、天命信仰，积累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经验和相关的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知识。

商周时代，天命、上帝信仰被稳固下来，各种知识进一步发展，上古治国理政的经验，经过周公、孔子、老子等思想家的创新和发展，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礼仪制度和国家治理原则。从这时候开始，国家的统一和政局的稳定成为中国古人追求的最高政治和社会目标。

秦朝的建立，在物质层面上使中国实现了事实上的统一。汉朝选择独尊儒术，使中国实现了思想上的统一。从此以后，儒术成为中国古代国家的正统指导思想。政权可以更迭，掌握政权的人物、民族出身可以变换，但独尊儒术则一如既往。儒术，为中国古代国家统治的稳定，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延续和统一，尽到了自己的努力和责任。而儒术的创始人孔子，也成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圣人，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标志性的符号。与疆土、文化上的统一相适应，国

家的统一被认为是正常的，是人们所向往的；国家的分裂被认为是不正常的。在国家分裂时期，盼望回归统一，是中华民族共有的心理，也是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国家的统一保证了文化的统一，保证了该统一文化的延续，使中华传统文化成为五千年来唯一不曾中断的文化。

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自称“述而不作”。实际上，孔子在继承古圣治国理政经验的基础上，又实事求是地研究了古代国家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进一步提出了“以德治国”等一系列新的观念。汉代独尊儒术，把从孔子开始、儒者们创立的“仁义礼智信”原则，落实到国家政治，创造了以“孝道”为中心的礼仪制度。这套制度对国家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带来了许多虚伪和假冒现象。于是在魏晋时代，王弼等人提出，有形礼仪背后那看不见摸不着的“无”，才更加重要。由于王弼等人说不出那个“无”有什么具体内容，也使那些崇无的人们各行其是，不守规制。到了唐代，以孔颖达《五经正义》为核心，提出了有形的“有”和无形的“无”同样重要。唐代末年，韩愈等推崇《大学》《中庸》和《孟子》，预示着儒学将步入一个新的时代。到了宋代，以程朱为代表，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编为《四书》，把个人的内心修养作为遵守儒学规制的前提，并且指出，那有形的“有”背后更加重要的“无”，就是“理”或者“天理”。理，就是秩序；遵守社会秩序，就是人的本性。人的内心修养，就是去体认这个天理，回归自己的本性。新的儒学把遵守社会秩序作为人心的自觉，从而进一步保证了社会秩序的稳固。

在儒学不断创新、发展自己理论的同时，佛教、道教也在更新着自己的教义。佛教中，出现了认为佛祖、菩萨、妖魔鬼怪不过都是心头的一念，只要明白本性清净，自身就是佛的禅宗。道教在成仙运动不断遭受失败的情况下，抛弃了肉体成仙的念头，甚至主张现实中品德高尚的人就是神仙。

然而正如被尊为“汉家儒宗”的叔孙通所说：“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在维护自己国家的稳定方面，儒学有杰出的贡献。儒学不主张侵略别人，但在遇到外部入侵的时候，也难以应对。特别是到了近代，遇到帝国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儒学更缺乏应对的本领。所以在最后关头，独尊儒术的清朝，不得不自己取消了儒学的统治地位。接着就是辛亥革命，再后来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中国获得了新生，也使中国传统文化获得了新生。

中国古代独尊儒术的国家信仰以上帝为首的神祇系统，原则上都是国家的保护神。在信仰这些神祇的人们看来，多一尊神祇，国家就多一层保护，就像国家又多了一员精兵强将一样。所以中国古代可以把外来的佛祖和本土的老子、孔子、都称为圣人。古代的其他国家，其实也是如此。只是后来，以个人拯救为核心教义的世界宗教尤以基督教为代表，把其他民族的神祇都看作是“偶像崇拜”，一定要加以清除，才改变了信仰世界宗教的民族的包容精神与和平精神。近代又加上资本主义的扩张要求，更使这些国家的包容文化与和平文化，几乎荡然无存。

中国古代的国家，从君主到民众，都是信神的。这是历史事实。孔子也曾被古代国家作为国家公神加以崇拜和祭祀，其地位和社稷神一样高，也是事实。但是，至少从孔子开始，历代都有思想家不断纠正和抛弃低级、粗陋的巫术和滥渎无度的鬼神迷信，这就构成了我国传统文化中历史悠久的无神论传统。

孔子当时所在的社会都普遍相信，彗星、陨石等奇异天象是体现上天意志的“天道”，但孔子不谈论与所谓天道有关的问题。孔子和他的弟子们也不相信墨家所说的人形的鬼神，所以被称为“无神”者。荀子则进一步指出，那些奇异天象只是不常见而已，并不是上天意志的表达。到了汉代，国家制定法令，把交感巫术认定为危害社会的“巫蛊”，提出了“淫祀”的概念。从此以后，取消和打击巫蛊、淫祀，即超出国家规定的祭祀，成为古代无神论者的常规事业。

汉代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应的新的神学观念，把过去喜怒无常、任意发布奖惩命令的上天，改造为根据人的行为善恶决定赏罚的上天，是儒学古代神学的进步。王充则进一步考察了董仲舒认定的那些天人感应事件，发现都不过是偶然巧合，从而否定了天人感应观念，提出了“天道自然”观念，是汉代无神论思想的重大成就。王充还否认人死为鬼，认为脱离了活的肉体的灵魂没有认知的功能。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者们反对佛教的轮回报应教义，范缜更是把精神和肉体的关系比喻为锋利和刀刃的关系，认为人死以后，不能有鬼，就像锋利离开刀刃就不会存在一样。唐代韩愈坚决反对皇帝迎拜佛骨，差一点送掉性命。柳宗元批评天人感应宣扬的“祥瑞”概念，认为这些言论类似于“淫巫瞽史”。他和刘禹锡一起，甚至否定上天的赏善罚恶功能。

到了宋代，欧阳修撰写历史，只记载异常天象和灾害事件，不再记录这些事件和人事的所谓感应关系，从而进一步否定了天人感应思想。他甚至斥责当时被认为是上天恩赐的《河图》《洛书》，乃是某些儒者假造的妖妄事件。明代的曹端不仅坚决反对民众淫祀，还极力批判当时新兴起的风水迷信。到了清代，熊伯龙接续王充的事业，把后世新增加的淫祀如梓潼神崇拜等，也作为他的抨击对象。

中国历史上的这些无神论思想，构成了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序列，为我们今天的无神论思想提供了宝贵的素材。但从整体来看，中国古代无神论思想的传播以及无神论者的遭遇是艰难的。无神论思想，特别是科学的、彻底的无神论思想，只有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社会，才有发扬光大的可能。

## “第二个结合”视角下对于无神论与宗教中国化问题的几点认知

张新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原副所长）

在全党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的今天，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体悟“‘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的深刻含义，对于我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工作者同样责无旁贷，而且给了我们进一步思考解答一系列理论问题的难得机遇。这些问题关系到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如何做到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相互统一、与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相互促进，具有丰富和深化“第二个结合”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现实意义。其中的重点包括：在一般将儒释道三家视为中华传统文化“三根支柱”的情况下，能否认为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包含一定的宗教性成分? 如何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无神论因素的作用和意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信仰观念及信仰形态能否为今后我国宗教中国化提供有益的历史文化资源? 等等。

上面每个问题都可以写成长篇大论, 我这里只能浮光掠影地发表一点片断的认知。

第一, 我们应该看到, 被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例举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性观念和标志性精神, 几乎都是产生于“轴心时代”以儒家为主的先秦思想家群体, 很多又是他们对三代以来华夏民族发展道路和历史经验提炼概括的结果。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优良特质, 十分重视通过考古发现追溯华夏先民的文明成就, 就是要说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内涵从上古时期就已逐渐成形, 说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平心而论, 中华民族至今崇奉和遵循的核心价值, 其基本理念多是在两三千年前就得到厘定和公认的。当时, 佛教道教都还未曾以完整的宗教面貌出现于中华大地; 倒是儒家思想为佛教在中国的未来发展预置了政治伦理和社会道德的原则规范(这些原则规范后来在超自然的“天”和先验的“天道”名义下固化为具有国家宗教性质的“礼教”信条和祀典制度, 开始作为束缚国人的“神权”绳索而逐渐走向自己的反面, 那是另外的问题), 也为自身从佛教那里吸收认识论、方法论养分准备了开放包容的潜能。所以, 说“儒释道”三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三根支柱”, 其实是有条件、有前提的, 不可超时空地简单化理解。不能割断思想史的根脉, 仅仅自限于中国封建社会中晚期的状况去谈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局部历史的格局范围里去认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甚至把反映封建社会落后腐朽态势的文化糟粕原封不动地捧为“优秀传统文化”; 那不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 而只是少数人浑水摸鱼、冒名取利的闹剧。当然, 佛教对中国思想文化一尊多元结构的补强扩展发挥了巨大深远的历史作用, 特别是佛教, 对外来宗教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下终于融为其宗教表象的一部分, 提供了“后来居上”的成功范例。而从根本上说, 佛教在汉代以降儒教中国的漫长历史长河中获得受容性存在, 主要是由于它们运用自己的“神圣性”“神秘性”资质, 对传播和巩固儒教天人感应、家国一体的政治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发挥了襄助、护持功用。在同一条历史道路的后段, 中国宗教从理论到实践越来越明显地、自发地走向“三教合一”, 一定程度上正体现出儒教在封建社会晚期力求进一步维护其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客观成效。因此, 如果要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寻找宗教性成分, 固然可能有保留地提到儒教宗天信仰为国人社会生活准则树立了约定俗成、日用不知的合理性、权威性, 但首先发现的应该是佛教这样的“后起之秀”为建立健全服膺、辅翼国家政治体制和主流思想文化的信仰形态, 而做出的与时更化的积极调适。这是中国宗教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系内最富有现实价值的优秀传统。在中华文明发展的新时代批判继承、创意发扬这个传统, 赋予其符合历史前进方向的新内容, 促成宗教中国化的新跨越, 将是“第二个结合”方针指引下我国宗教领域工作对国家和人民应该交出的一份合格答卷。

第二, 有一种认识提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色是人本主义的, 而不是“神本主义”的。在这个意义上, 可以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天然”的无神论倾向。前已述及,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基本上是由儒家为主的先秦思想家群体确立和阐扬的。当时, 受到社

会广泛接纳的制度性宗教还没有问世，先秦诸子的宗教意识包括“神观”呈现出相对属于“前人为宗教”的状况。由于相应的宗教有神论体系还不完备，此时如果一定说有“无神论”思想，也只能表现为一种异见“神论”。这种“神观”或“神论”的宝贵特质，不在于也不可能在于超越历史发展阶段彻底否定超自然“神”和“神力”的存在，而是在于通过消弭“神”与“人”的界限，把“神人关系”降解为现实社会关系的一种理想取向，让“人性”与“神性”、“人愿”与“神庥”建立起不同形式的同一性，最终完成为人的现世生活提供服务的功能。“神道设教”就是这种“神观”在官方政策上的显现。而且，这些从中华文明的“前人为宗教”时期就积累起来的“神观”“神论”，被后世儒家士大夫在佛道教崭露头角的时代，用作质疑破斥一部分宗教神学理论以及附丽在这些宗教上的世俗迷信行为的隐性指导，仍然全无违和感。正是在中华民族特有“神观”的形成、诠释和应用上，中华传统文化展露出自己在模塑国人信仰形态方面的人本主义底色。这种精神现象，比西方宗教更直接、更清晰地反映了“神为人造”的客观事实，也促使中华传统宗教越发注重培植本身的“人间性”“人文性”，以迎合信仰主体的文化心理。历史上的中国特色“神论”就是这样被纳入古代中国无神论思想的发展进程，就是这样影响了中华传统宗教的理论和实践范式，并且始终以维系传统“人神转化模式”的能动性，保持着参与建构中国特色“非神本主义”宗教的活力。总起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观”，即使不站在无神论研究的角度去审视，也不能否认其闪烁着原生的人本主义光芒，与异质文化中一神教的“神本主义”大相径庭。这是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一样不乏宗教性历史文化成分的同时所独有的信仰品格，这种品格决定了社会选择宗教性事物的标准是优先满足“人”的实际需求，而不是驱使人充当“神”的奴仆。从历史深处延续至今的那些中国传统宗教，由于能彰显、呼应这种独特品格，得以演进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机结构。如果认为这种品格比西方基督新教更早地“拥有向无神论发展的前提”（恩格斯语），并且以推动中华传统宗教的“非神本主义化”而从宗教信仰领域印证了“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它当然有资格迈入“优秀传统文化”的门庭。有这样一种现实生活重于彼岸世界的价值信仰的无形笼罩，一当号召人民群众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被剥削压迫地位的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相比于某些“神本主义”历史包袱沉重的域外国情民情，确实更有利于激发工农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想的共鸣与追求。虽然我们不能说包含人本主义底色的传统文化径直等于马克思主义的同盟军，但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借助来自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文化智慧的顶托，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仅仅用一代人时间就推翻了“三座大山”。连美籍基督教神学家保罗·蒂利希都觉察到了儒家思想与共产主义信仰之间有所契合，他1957年在《信仰的动力》一书中明确认为，儒家“是世俗性的共产主义信仰获胜的积极条件”。历史经验可以上升为文化自信的增量来源。我们全面地评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人本主义“神祇观”“宗教观”的塑造能力，辩证地看待和善用其后续精神文化产品所携带的中华文明基因，将会更有信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宗教领域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信心推进对中国特色宗教现象的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

的统合交融，使新时代“第二个结合”的这项宏伟工程不断展现出新的境界。

第三，根据以上认知，可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信仰观念及信仰形态能否为今后我国宗教中国化提供有益的历史文化资源”问题，做出合乎逻辑的肯定回答。我们现在提出的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既是历史道路的自然延伸，更是新时代新形势下的使命提升：既要求已经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部分的传统宗教翻开“中国化”新篇章，全方位跟上新时代的发展步伐，又要求较晚进入中国的外来宗教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学习和增益与中国社会主流政治、主导思想和谐相处的生存之道，包括对中华传统价值体系在本宗教“处境化”“本土化”历史上曾经占有而后来被各种外部因素干扰削弱的重要地位进行重新标定，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顺畅对接。对于这些外来宗教而言，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学习，也包括借鉴效法中华传统宗教传承史上的工具理性发展路径，自觉地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意识到和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这样做，不是表示这些中华传统宗教已经满足新时代“中国化”的新要件，或者依靠表面文章就可以完成新时代“中国化”的新任务，是要重点启发外来“一神教”在信仰观念和信仰形态方面，与这些已经在历史上闯出一片“中国化”天地的中华传统宗教主动寻求某种涵化、共构的可能，以从文化特征、社会功能上衍变为真正的“中国宗教”，直至一道成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动一角。这是我国宗教中国化将要达到的远大目标，也是“第二个结合”必将取得的历史性、世界性成果。

## “第二个结合”与宗教中国化

赵文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教授）

我国正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包括建设现代物质文明和现代精神文明。

我国现代物质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就是现代化。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表明，决定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动因、目的、方式的因素，既有客观的社会历史环境，也有主观的价值选择。这种选择，在不同的国家可以有很大的差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形成的“发展生产力”“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民富国强”价值观，是中国现代化的巨大动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形成的“天下大同”“团结互助”“义利兼顾”“人的全面发展”“天人合一”“顺应自然”“崇尚和平”“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价值观，决定了中国人选择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方式和目标。

我国现代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文化建设，而文化的核心就是价值观建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为中国文化提供了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世界潮流、充满生机活力的价值观。它们集中体现在“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一系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同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同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高度契合，与中

华文化“人文理性”“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原则高度契合。

宗教中国化，意味着中国宗教要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而这种适应，是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大环境下进行的。因此，当今，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要就是适应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社会实践环境。这就要求，我国宗教自觉地为中国式现代化做出贡献，自觉地去掉自身那些不利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因素，自觉地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和目标。而这一切的前提之一，就是要深入理解和高度认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产生的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和指导中国人民选择现代化模式的价值观。比如，要适应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就必须了解、理解、认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形成的人的全面发展价值观。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人的健康的物质追求和健康的物质追求得到更大的满足，人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能力得到更大的提高，人在与自然的关系中更有智慧和力量。

宗教中国化，意味着我国宗教认同中国文化，融入中国文化。在今天，重点就是认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的从精神上支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体现这些价值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地向它们靠拢，不断地吸收它们的元素，最终全面融入这一文化体系之中。

## 在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指导下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史学

宋月红（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思想根源和理论根基。“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中华优秀传统史学以浩如烟海的史料、汗牛充栋的史著、源远流长的史论，记录、承载着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发展史，也秉持和彰显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朴素的历史认知乃至“无神”观念。这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历史科学的基本态度具有相应契合性。其中，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的起源和演变、在历史变迁中的地位和影响，是历史观蕴含的重要历史逻辑和文化理念，并影响到对历史文化的传承发展、对历史的研究和编纂。为此，需要从中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无神论与宗教观的内在机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包括中华优秀传统史学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历史观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相互契合和融合，但又是居于基础性地位。中华优秀传统史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历史底蕴和历史依据，其在社会历史变迁中生成、延续和变革的历史观经由史书、史论而积累沉淀并记载编纂下来，成为历史文化的重要标识和载体，融入、内化到各个历史时期的思想文化变动之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传播以前，中华优秀传统史学经历中华古代和近代史学，既是中华历史文化遗产发展的重要内容 and 载体，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确立和发

展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基础。中华古代史学在先秦时期，以神话传说和文字记载，既有传承祖先改造大自然和发明生产生活方式的故事，又有记述上古历史、地理、文化、民俗等多种内容，形成一些具有奠基意义的史学传统和历史文化理念。中华近代史学以进化论推动认识和研究历史，提出“史界革命”“史学革命”，推动中华古代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其研究和编纂贯通性地记载了中华历史、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从古及近的发展史，形成一系列史论，提炼出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认知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丰富理念，从历史的角度记述并彰显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然而，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产生以前的历史观中，存在着宣扬历史是神造的、天命的意识和观念。此为神权的历史观、天命的历史观，掩盖、否定了历史的本质和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随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及无神论的传播，我们需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进步历史观，推动中华文明开辟新纪元。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一支重要学术、文化力量，接受、传播马克思主义，并研究、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同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不断推动处于并参与这一历史发展之中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特别是中国社会历史观、世界观、民族观、宗教观、文化观的变革发展，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历史研究逐渐从根本意义上由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来认识和处理中国历史与实际问题的，伴随新中国建设和发展而蓬勃开展起来。

## 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思想文化基础上推进宗教中国化

曾传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经过将近两个一百年在苦难中的砥砺前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烈火中重生，此世界舞台中央，正在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奠定了基石，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打下了思想文化基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汲取提炼了中华文明的人文理性的精华、西方近现代文明科学理性的精华和科学社会主义人类全面自由发展理想的精髓而形成的结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特征是人文理性。在中国封建社会大多数历史时期长期居于官方哲学地位的儒家思想总体上是为处理人伦关系而创设、发展和壮大的。孔子有“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君子三畏”的说法，孟子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集中展示了中华传统文化政治哲学的特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以民为本的文化，它虽然也相信神祇，相信天命，具有超自然崇拜的思想和心理。但儒家对来世抱持不重视、甚至是怀疑的态度，代表性观点就是孔子“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看法。而世界各大宗教无一不是以来世为终极追求，并将美好来世看作比今生重要。宋明儒学对佛道教追求来生的思想多有批评。道家创始人虽然不否认神灵存在，但天神并不具有终极性，它们后面还有本体的“道”在规定一切（“像帝之先”）。庄子干脆说：“六合之外，存而不

议。”对超自然存在抱持冷静的不可知论态度。后起的道教虽然追求长生成仙，也相信天神、地祇、人鬼，但他们也主张“太上之象，莫高乎道德；其次莫大乎神明”（《云笈七签·总叙》）。大乘佛教受到过希腊哲学形而上学和美学思想的影响，大乘空宗因明思想对中国传统辩证思维有很大的提升，但并未将其形式逻辑体系传入中国。其形而上学的超越性并未得到张扬，而是走向了以禅宗为代表的主观内化提升的路子。

近代科学诞生在欧洲，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近代科学传入中国以来，尤其是高举科学、民主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中华传统文明面貌为之焕然一新。“科学救国”的思想是无数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对国情进行分析后提出的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方法论主张，逐步汇集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发展方向。它影响了民主革命，也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奠定了丰富的思想基础，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不可忽视的力量。改革开放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更是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战略思想。在新时代，我国已经崛起为科技创新大国。

以科学理性、自由民主相呼应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将欧洲从封建神权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人类的创造力得到空前的释放，生产力得到空前的发展。但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明了这种政治革命和政治解放的局限性，并明确提出了超越政治解放的人类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的理想。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的自由是孤立的、封闭在自身的单子里那种个人的自由，而平等只有在每个人都同样被看作孤独的单子时的平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谓的人权就是私有财产不可被剥夺的权利，所谓的安全只不过是“利己主义的保障”。资产阶级所标榜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是虚伪的。改革开放以来建立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摆脱了资本统治的市场经济，因此为避免人摆脱作神的奴隶却成为资本的奴隶的异化逻辑，提供了无限发展的空间。这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政治经济基础，是中国式现代化超常规良性发展的根本制度保证。

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在中国现代史上，有几次重大的思想解放都有特定的针对对象，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反帝反封建，20世纪80年代的真理标准讨论是针对“两个凡是”。这次思想解放针对的对象是什么，我个人认为，它针对的是“单一现代化模式”，是对以“新自由主义”“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等为代表的后冷战思潮的清算。在宗教学方面，后冷战思潮在美西方有号称代替宗教世俗化理论的“国民宗教论”“宗教市场论”，国内则有宗教文化论盛行一时。在此话语下，宗教是个好东西，要对宗教好一点，更好一点，这曾经成为宗教学界的主流潜台词。

“两个结合”语境下，新时代我国宗教中国化的实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引导中国宗教走现代化、实质上也是世俗化之路。宗教要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人文理性和科学理性相协调，而不能成为人类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的障碍。

（责任编辑：秋 影）